

# 评 2005 年的日本教科书事件

王智新

---

---

**内容提要** 2005 年 4 月 5 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审议通过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由此引发了今年的教科书事件。本文即对该事件的过程和《新历史教科书》的内容进行分析,指出该事件对日本社会以及邻国的影响。

**关键词** 日本 教科书 事件

---

---

## 一 《新历史教科书》的检定情况及特点

今年 4 月 5 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布明年新学期(春季)开始使用的新教科书检定结果。据介绍,文部科学省今年一共受理了 9 门专业 103 种教科书的鉴定申请,经过严格、公正的审定,除了保健体育专业有一种不及格外,其他的 102 种全部及格。整个检定过程中,教科书审查官一共提出了 4854 条意见,其中理科最多,有 1463 条,其次是公民科 1264 条。合格的教科书其中果然不出所料,因史观和对民主政治及天皇问题的记述而备受争议的扶桑社的中学社会课《历史》、《公民》也包括在内。据资料显示,本次检定中,扶桑社的《历史》、《公民》被指出的问题之处仍各有 124(上次 137)和 75(上次 99)处,在各家出版中遥遥领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次检定时就提出来的 143 处问题处中,有 80 处在这次的白皮书中得到修正或是被删除了。

新版《新历史教科书》修正的问题集中在常识性的错误或不恰当的表现方法方面,而在内容取舍和大的倾向性变化方面主要有以下 3 点:

(一) 反美或仇恨美国的立场的变换。旧版本中对美国的描写和记述是相当严厉乃至是不友好的。如从 1853 年佩理率领舰队来到日本叩关开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日本为假想敌(橙色)作战方案,以及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美两国在外交战中,“美国截获和破译了日本的密码电报,完全掌握了日本的动向,对日本进行欺骗和诱导”的内容,在新版全部被删去或是改写的相当温和友好,还特别用小栏目,专门介绍美国前任大使是如何东奔西走,为拯救日本而呕心沥血的“动人事迹”。

(二) 突出强调天皇史观。有关天皇的记述,从总体数量上来看时比旧版本减少了许多,如有关天皇的神话的介绍以及神风突击队员留下的表示效忠天皇的遗书等,都被删除或是简化了,连平时被他们奉为日本人道德准则的《教育敕语》,这次也没有像上次全文刊载,而是以现代文简单地加以归纳介绍。但是,却着重记述了神武天皇,强调日本的历史就是天皇与国家统治者“辉煌的历史”。

(三) 坚持将对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发动战争,进行的侵略责任全部推给受害国家。把日本进行的侵略战争写成是为了“民族独立”,“保全亚洲免遭欧美侵略”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编纂会的历史教科书,本次修改与上次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本次所改动的主要是上次妨碍了采用的部分,其中也包括了涉及到编纂会基本立场的内容,以及书的装帧设计,扩大版面,增加新的彩色插图和换开本等,可谓是费尽了心机。这大概是由于这一部分的执笔者或者已经退出编纂会。而强调联合美国,则是要开始新一轮“脱亚入欧”了。由此我们也可

以看到,编纂会这次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他们对于采用的多少抱有很大的危机感,如果这次采用还像上次那样少的话,扶桑社社长已经放出话来了,他们赔不起,将退出不干了。但是,如果采用率高的话,编纂会计划进一步扩展,准备编写中小学用的国语,地理等教科书。可见,今年的采用将决定编纂会教科书命运的。为了赢得更多的采用,甚至不惜引起内部对立进行大幅度修改。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这次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目标就是要在 2005 年实现 10% 的采用率。

## 二 编纂会的阴谋与实施行动

这几年经过编纂会“拉致连”(援救被北朝鲜绑架的日本人全国联络会)和原有的右翼组织上窜下跳,为历史翻案的全国性组织渐渐形成,并与各地方议员联手,对各都道府县的学校和教育委员会施加压力。在教科书的选择阶段,“编纂会”及右翼政客把目标集中到各个市町村议会和地方教育委员会,寻求逐个突破。2004 年,尽管有许多团体反对,但还是如愿以偿,在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强力支持下,东京都教育委员会主导的首家都立中高一贯校——白鸥高校于 2005 年正式开校之,正式选用《新历史教科书》,成为右翼历史教科书进入学校的突破口。

今年对编纂会来讲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没有强大的反对派,自民党独自坐阵,而且以前一直帮助和支援编纂会,与编纂会同心同德的政治家,都进入内阁。地利:从首都东京开始,北到埼玉,南到爱媛,西到广岛、鹿儿岛等,这些地方上的首脑都与编纂会有关系,是铁杆“保编纂会派”。人和:在救援拉致人员的支持下,编纂会成员觉得自己走路也挺起了胸膛,他们认为,拯救日本人,这一目标终于成了一亿三千万日本人的共同目标了。

为了达到 10% 的采用率,他们耍了很多阴谋。

### (一) 先声夺人, 抢先登滩。

鉴于上次采用过程中的教训,日本文部科学省于 2002 年 7 月 31 日下达了一个《关于改善教科书制度》的通知,要求各地在教科书审定过程中,为保证审定人员不受外界干扰,公平进行审定,“一定要有个良好安静的氛围和环境”,在审定结束之前,严格杜绝送审的“白皮本”泄露,如果有哪家出版社泄露,扰乱了安静的审定环境,就立即中止对该出版社的审定。在同年 10 月,文部科学省还对《教科用图书检定规则实施细则》作了修改,增加了“在审定结果公布之前,送审者应采取措施坚强管理,以免有关内容泄露给与检定无关的人员”的规定。

将通知上的内容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果然奏效,这次消息封锁的确实相当严密,圈内的人都没有看到送审的样稿,一般的人更是连消息都听不到。但是编纂会的成员对此却置若罔闻,大会小会到处宣传自己的教科书,编纂会在去年 7 月出版的该会的会刊《史》上,以“这就是新教科书”为题,开辟专栏,集中介绍了正在审定中的扶桑社历史教科书的修订内容。如,“大东亚战争促进了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马来西亚等国独立,与他们摆脱列强统治有直接因果关系。我们的教科书对这一历史事实公平地加以记述,这在战后历史教科书中是前所未有的”。“对于那些为敲打日本而捏造出来的谎言,如南京大屠杀,强虏朝鲜人,强行征集随军慰安妇等,本书一概不涉及。是一本完全不受敌对国家宣传影响的、百分之百自由撰写的新历史教科书的修订本”等。另外,在去年 10 月 17 日的读卖新闻系统的电视“高绅彻底谈一下——委员会”节目中,编纂会的西尾干二名誉会长手持白皮本登台亮相,自豪地介绍说:“这次大幅度的修订,增加了不少漫画,比别的出版社还要多些。”藤冈信胜也在 12 月 22 日的《产经

新闻》上发表文章,透露正在审定中的教科书的消息,对当时正遭受批判的高桥担任埼玉县教育委员会委员一职加以辩护,说“高桥史郎不是明年审定版教科书的执笔者,与审定中的白皮书毫无关系”。

对于类似问题,特别是扶桑社方面散发白皮书的问题,文部科学省当然不会一无所知。文部科学省的官员在听到反映后曾 3 次传扶桑社负责人到“省里训话”,要他们小心行事,不要太招摇了。对此,扶桑社方面的回答是,我们借了几本给地方教育委员会的“朋友,希望听听他们意见”。对此文部科学省也不加深究,听之任之了。谁知扶桑社根本没把文部科学省关于白皮书不许外流的禁令放在眼里,还是我行我素。直到第三次被文部科学省传讯时,他们才假惺惺地表示检讨,说是“我们管理的不力”。但是,时间已经是 2005 年 3 月 25 日了,如果对扶桑社动真格的话,那编纂会的教科书就会胎死腹中,那也是文部科学省,首先是文部科学大臣所不愿看见的。所以只好将此事隐瞒起来。闻知此事的市民赶到文部科学省去质询并提抗议时,他们先是不受理,后被逼无奈只得说:“这么点芝麻绿豆小事,不必大惊小怪的。”由此可见文部科学省是如何偏袒编纂会的了。

## (二) 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以前,编纂会的教科书象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为了摆脱这一被动局面,他们一反常态,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他们施用了恶人先告状的手法,主动出击其他出版社。对其他出版社的教科书进行研究分析,将其中不同于自己记述的有关部分(如南京大屠杀、随军慰安妇等)详细列出,统统指责为“荒谬的教科书”、“难以想象的教科书”,加以攻击和诋毁。标榜“各出版社普遍都在降温(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罪行进行记述)的时候,也只有扶桑社的教科书鹤立鸡群,不受左翼学者和中国等外国压力的影响,对

日本的未来负责”。并且将其他出版社教科书中有关揭露和记述日军在战争中犯下罪行的部分,复印散发,做成宣传板,同时在各地巡回举行“战争展”,“教科书展”,向人们展示在战争中干坏事的并不是日本,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宣传在历次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等战役)中,“日本军队是最有纪律,军风纪最好,作战最勇敢”,“世人有口皆碑的皇军”等。向参观者诉说中国、韩国等国家的教科书是如何“开展反日,仇日教育”,“这些国家的教科书编撰一点不民主,还有什么资格对日本的教科书制订指指点点的”等。以这种方式大肆贩卖自己的观点,“努力向大众启蒙,让他们一点一点地觉悟”,以打击正确的记述,扩大自己的影响,可谓一箭双雕。同时与右翼政治家、媒体人士联手攻击中国、韩国的教科书和历史教育是反日的,叫嚣要向中国抗议历史教育,要中国等停止反日教育。甚至说,“为了维护共产党的威信,中国政府将日本当成靶,煽动反日情绪”等等,竟然向日本民众说这是所谓“中共的阴谋”。

### (三) 将教科书问题国际化。

当前整个日本都在从原先叫的震天响的“国际化”中往后倒退,凡事以自我为中心,以邻为壑,不顾别人。但是,编纂会等极右组织却完全相反,大有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之势。

这次教科书检定通过之后,编纂会在 4 月 10 日就迫不及待地召开记者招待会,介绍自己的杰作,企图通过新闻媒体来为自己作宣传。他们认为:“国外的民众和团体实在不了解我们编纂会的真实意图”;那些批判我们教科书的人连“我们的教科书看都没看,就在那儿写文章批判了”,所以要向这些持批判态度的学者直接喊话,向他们递送信息,以“消除他们的误会”。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还不惜工本,将教科书中最有争议的部分翻译成中文,并在其网站上刊出。为此还破例在第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后仅一个月的 5

月 10 日又匆匆忙忙地举行第二次新闻吹风会。在会上编纂会第三任会长八木秀次说：“有一些外国领导人，没有读过我们的教科书，就批评我们。我们将其中有关部分翻译出来以供参考。”八木秀次还大言不惭地说：“我们相信，我们写的中国和满洲是事实。我们正在为日本人民写日本历史，所以这同韩国人、美国人和英国人说出的历史是不同的，这是自然的事。”看来他们真的信奉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佩尔的那句“谎言重复一万遍就可以变成真理”的“名言”了。目前，编纂会已经将教科书中有关中国和朝鲜半岛的部分，翻译成中文和英文。编纂会还气势汹汹地摆出一副打擂台的架势，叫嚣要和中、韩两国学者辩论。

通过他们刊登的译文我们也可以看到，该书对南京大屠杀只是简单地提及说：“日本军原来以为只要攻陷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蒋介石就会降服，于是于 12 月占领南京。然而蒋介石却迁都到后方的重庆，持续抗战。”并没有给出死难者的数字。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及南京大屠杀问题时，编纂会副会长藤冈竟然胸有成竹地回答道：“根据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在南京，有 15000 名中国士兵在战斗中死亡，杀害平民的事只有一件。”简直把记者都当小孩骗了。关于 1920 年代末期入侵山东，该教科书写道：“1928 年蒋介石在控制住北京之后，成立了新政府。中国统一的动向，也渐渐影响到了和日本权益所在的满洲，为此日本曾以保护居民为由，3 次出兵山东地方。”荷兰记者在招待会上问道：“你们写了德国纳粹和前苏联两个独裁国家，战前的日本不也是独裁国家吗？”对此，也是藤冈回答说：“战争期间，有一段日本民主主义的程序没有能很好运转，但是，明治宪法没有中止，也没有出现像希特勒那样的独裁统治者，所以我们不认为日本是独裁国家。”甚至对记者“关于战争的记述是否少了点”的疑问，藤冈大言不惭地回答说：“我们的教科书没有美化战争。”

倒是编纂会的各位先生们,对中国和韩国学者的批判文章根本就没看过,不要说什么研究了。因为,中韩学者批判的就是这种篡改历史,把战争责任全部推到受害者头上的观点。其实,对编纂会的教科书持批判态度的又何止是中韩两国呢,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人民一直在强烈地批判编纂会的教科书,反对篡改历史。至于这些国家为什么政府不出面公开抨击日本篡改历史,町村外相心里最清楚,在一次日本国会审查预算委员会上,有议员提出既然 ODA(日本政府援助贷款)达不到目的,日本国内经济又不景气,这个项目干脆就砍掉吧。谁知町村外相一听就急了,说:“不能,万万不能,连削减都不行,(因为)我正等着拿这笔钱去让那些国家闭嘴,并让有些国家为我国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说话呢!”

#### (四) 争取地方教育委员会的支持。

编纂会认为,向地方县市教育委员会教育长做工作,争取教育委员会成员 2/3 的支持和同情,这样一来在采用投票时就稳操胜券了。为此,该会有计划地展开“局部地区战和全国统一战”,与地方上的保守势力、右翼<sup>①</sup>配合,协同作战,努力争取扩大会员(目标是会员人数翻倍)。发展会员的重点放在爱媛县,爱媛现任县知事是原文部省次官,与编纂会有着很大渊源,在 2001 年采用中,该县的县立残疾人学校和县立聋哑人学校采用了扶桑社的《新日本历史》。翌年夏季,在县知事的指使下,不顾县民的强烈反对,悍然决定,2003 年新设立的县立初高中 6 年一贯制学校中也采用扶桑社的《新日本历史》和《分民》教科书。这无疑是给编纂会成员打了一剂强心针,因为,以前的采用都只是在私立学校和残疾人等特殊教育学校,这次扩展到了公立学校,使他们感到无比振奋。为此,

① 日本的所谓右翼,泛指“具有保守、国粹思想倾向”的人和派别,是保皇法西斯主义的日语表述。

动员“日本会议”等右翼势力,要求他们“全力以赴”,掀起“新的浪潮”,并制订出下一步目标是“广岛”、“东京”(2004 年)、然后走向全国。去年 8 月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在石原慎太郎知事的授意下,仅用了 5 分钟的时间就决定,将于明年 4 月招生的东京都第一所都立初高中 6 年一贯制中等学校、白鸥高中附属初中使用扶桑的历史教科书。

两年过去了,编纂会基本上达到了目标,把这两地新成立的初高中一贯制的学校“拿了下来”。现在以藤冈信胜为首的“初高中 6 年一贯制中等学校对策本部”,正在努力扩大战果。

(五) 与“救援拉致”组织联合一起行动。

目前日本国内对所谓朝鲜的“拉致”问题关心异常之大,全国上下沸沸扬扬。编纂会强调自己的《公民》教科书是唯一记载有“拉致”问题的,所以积极与“救援拉致组织”一起活动,企图借“救援拉致”的影响开展活动。他们在报纸杂志上与“救援拉致”成员座谈,还在各地共同举办集会,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 三 文部科学省由幕后走向前台

上世纪 80 年代发生教科书事件的时候,我们还清楚的记得,日本政府和文部科学省(当时还是文部省)的官员们,对发生这种事情,在口头上都是表示“遗憾”或是“震惊”,并愿意“以大局为重,妥善处理”,所以才会有 1982 年的《近邻国家条款》。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笔者在内,对这种含糊不清的所谓《条款》表示非常不满意。但是,事隔 20 年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一《条款》时,却有隔世之感,现在不是如何评价这一条款,而是要不要的问题了。这一条款从制订日起,就一直受到右翼攻击,他们认为这是日本“耻辱外交”的产物,坚决要求废除,每年都举行签名请愿活动。最多时

一次可动员到 800 多万人,这对政治家来讲可是不小的数字。

在右翼集团连续不断的猛攻下,日本政府终于动摇了,他们先是对这一条款的合法性加以质疑,以淡化人们对前不久发生的教科书事件的记忆。在 2001 年发生明成社事件时,当时的首相森喜朗还公开表示要遵守《近邻国家条款》。但是,当时的文部大臣町村在 2001 年的一次国会辩论中,竟按照右翼的调子说:“(1982 年)发生的将‘侵略’改写成‘进出’的教科书事件,纯属报道错误,子虚乌有。”对前任内阁作出的关于《近邻国家条款》的前提,公开加以否认。这样一来,文部科学省也就有了无视和践踏这一条款的理由,每当有人质询他们在检定中为何不遵守《近邻国家条款》时,他们总是顾左右而言其他,不作正面答复。终于,到了 2005 年 4 月,现任文部科学省副大臣下村博文,在一次演讲中公开诬蔑《近邻国国家条款》是“自虐史观条款”。

现任的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则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信奉者。去年 11 月,刚刚走马上任的中山在大分县别府市举行的市民集会上谈及历史教科书审定问题时说:“总算到了最近,‘随军慰安妇’、‘强掳劳工’等词语(在教科书中)才有所减少。”公然对以往的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揭露当年日军罪行的“随军慰安妇”、“强掳劳工”等内容表示不满,强调“这种极其自虐式的、认为日本只做了坏事的内容充满了(教科书),不能再任其泛滥下去了,(日本)不能根据‘自虐史观’来进行教育”。在检定结果公布后,大家都明显感到检定有失公允,纷纷提出批评。但是,身为教科书检定最高负责人的文部科学大臣却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偏袒扶桑社,说“我认为扶桑社的教科书很好,很公允”。

文部科学省终于撕下了以前的伪装,从幕后走到前台,全面指挥篡改教科书,公开为右翼捧场叫好了。在教科书检定中的修改表面看来是出版社的自主所为,实际上却是日本政府、特别是文部

科学省暗中施加高压的产物,这在以前就是公开的秘密,但是现在连遮羞的面纱都顾不得要了。1998年,当时的文部大臣町村信孝在一次回答参议员质询时说,实际上历史教科书“缺少整体的平衡”,“特别是否定明治以后的日本历史的地方太多”,“希望各编辑人员在今后审定教科书时注意保持平衡,并留有进行修改的余地”。根据町村的这个答辩,1999年1月文部省向教科书出版社经营者提出,“教科书内容要更加平衡”,“教科书作者队伍的组成也应有所变动”。当年8月,东京书籍、教育和帝国书院三家公司申请自主订正教科书,在对“从军慰安妇”的表述中,删除了“从军”、“强制”等词句。文部省于同年12月批准了上述修订。

1999年12月,日本首相官邸的一位人士出面给中学教科书出版社总经理打电话,要求他慎重处理对“从军慰安妇”的表述。在这位“首相官邸人士”的政治压力下,各大出版社都作出了“自我限制”的决定。某出版社总编辑今年2月前后对教科书作者说,“从出版社的利益出发,我们决定删除‘慰安妇’的内容,把南京大屠杀的注释也取消,希望你们同意”。某出版社编辑部负责人在解释内容变动的原由时也承认,“这是上面的指示”。

对敢于坚持说真话,对他们的做法表示不赞同或是持批评意见的人,无论是哪个阵营的,他们都严加封杀。今年4月检定结果公布后,《朝日新闻》找了几位专家谈对这次检定结果的看法。其中早稻田大学天儿慧教授在大谈了一阵教科书检定制度的优越性(因为他本人是公民科的专业审查员)后表示,历史教科书,不能只写历史的一面,而忽视历史的另一面。同时他希望中国韩国不要太过于顶真了,因为扶桑社教科书只不过是许多教科书中的一种。但是,就是几句话,也立即遭到右翼的人身攻击。《产经新闻》把他的“老底”也给抖出来了,说他是“冲绳反军事基地建设”的活动分子,是“一坪土地的地主”(反对建设美军基地的人,每人购买一坪

土地, 拒绝把土地出让给美军)。文部科学省官员也公开表示, 身为教科书审查员的天儿慧发言太轻率, 等于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并表示要追查他“一坪地主”的问题。

从上述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历史教科书问题不是学术问题, 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日本政治走向的风标。而随着日本的右倾保守化日趋严重, 教科书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因此, 包括历史学者在内的正义人士, 要有与右翼在教科书问题上进行长期斗争的准备。

(作者王智新, 日本宫崎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荣维木)

## 更 正

2005 年第 1 期  
第 168 页 申玉山

误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正  
河北经贸大学  
人文学院讲师